

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楊慶中 廖娟 編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主 编：纪宝成

执行主编：黄朴民 梁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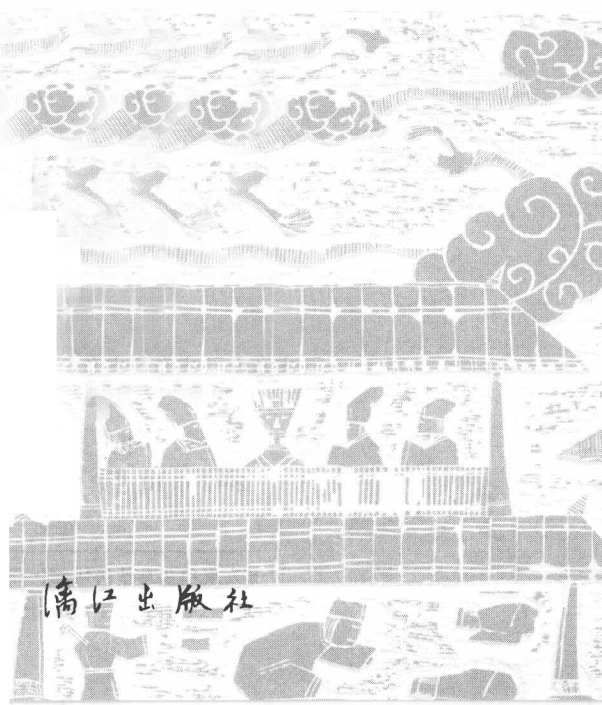
叙述的《八旗表》莫及的。我自知著作有两点我觉入掘出他们的圣人是足以乱古人的真话是以乱古人的真话。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迷惑古人，不知道孔打的话也是有意迷惑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

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是个极笨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古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描述相像的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断可测，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必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靠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一《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竟要辨明古史，

漓江出版社

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杨庆中 廖娟 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杨庆中,廖娟 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0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407-5887-5

I. ①疑… II. ①杨… ②廖… III. ①出土文物—文献—研究—中国 ②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K877.04 ②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982 号

组 稿:张玉琴

责任编辑:阎海文

封面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3.5 字数:34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在“机遇与挑战：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代序

纪宝成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向出席“机遇与挑战：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致以亲切问候和热烈欢迎，对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人大国学院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50年后大量的出土发现，再次证明王国维先生当年的精辟论断。上个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的出土，掀起了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中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齐孙子》与《吴孙子》的问题，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发现则揭开了聚讼千年的思孟“五行”之谜，而《黄老帛书》、帛书《周易》、《易传》、帛书《老子》等文献的发现，同样大大推动了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些文献是如此珍贵和重要，以至于有学者称，它们的发现可视为开辟了一个学术研究中的“马王堆的时代”。

到了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蒸蒸日上，或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或因为贪欲刺激下的罪恶盗掘，一批批深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先秦竹书，纷纷重见天日，呈现于我们眼前。其中上个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的问世，掀起了简帛研究又一个高潮，郭店竹简中不仅有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版本，以及《太一生水》这样珍贵的道家文献，同时还发现《五行》、《缁衣》、《鲁穆

公问子思》等子思佚籍,使我们有可能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补上“孔孟之间”的空白,其学术价值难以用语言简单估量。故有学者称,出土文献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郭店时代”。

郭店竹简之后,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战国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相继公布和介绍。这些新发现的文献,有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对读,有些则完全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珍贵佚文。它们的失而复得,不仅给学者们带来极大的激动与振奋,也使我们有可能直接触摸到古人的真实心灵,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远比已知的要丰富、复杂。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先生在上个世纪所能看到的出土资料,主要是甲骨、金文,以及西域沙海中的汉晋木简等,而对于直接书写在竹简、帛书之上,记载古代思想、学说、文化的文献,则是完全没有见到的。至于这些新发现的竹简数量如此之多,其记载、反映的内容如此之丰富,恐怕是王国维先生想也没有想到的。王国维先生没有想到的,今天却成为了事实,故今日之时代才可谓之“发见(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语)。与王国维那一代学者相比,今天从事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学说研究的学者,可谓是生逢其时,是真正的幸运儿。

然而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所言,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出土文献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经学、子学、文字、文献学等多个学科。一般而言,可分为古文字研究、文献学研究和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三个序列。其中文字、文献的研究是基础,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是最终目的。由于近些年发现的郭店简、上博简等新资料多是思想性文献,故在第一序、第二序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延伸到第三序,从古文字、古文献的层面上升到思想史、哲学史的层面;如何通过简帛研究的新发现挑战原有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和预设,如何通过思想史研究反思简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及精进,便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庞朴、李学勤、杜维明等先生提出了“重写思想史”的主张,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但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学者表示质疑和反对。我们认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谓研究就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补充、推进、完善,甚至推倒旧说,创立新见。陈陈相因,照本宣科,虽然是知识传播的必要手段,却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从这一点看,“重写思想史”每天都在发生和进行,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就应不断超越前人,开拓创新,而不应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只不过近些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重写思想史”,为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创

新,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而已。当然,“重写思想史”并不是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贡献,也不是为了片面夸大出土文献,忽视乃至贬低传世文献。相反,只有充分重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才会有新的创见、新的发现、新的建构,才会大大提升和推进已有的思想史研究水平。这种深化与进展,显然就是在重写思想史。

这次出土文献盛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既是机缘巧合,也带有某种必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成立起,始终坚持“大国学”、“新国学”的理念,筚路蓝缕、脚踏实地、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开展全方位的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受到社会各界、上级部门和国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倡的“大国学”的“大”是指“有容乃大”的“大”,而不是“大而全”的“大”。它包括三义:一、从知识形态来看,“大”是强调我们不仅关注和研究古代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关注和研究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这里的“大”是包容的大。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是突出我们主张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培养通才型的学术人才。这里的“大”是贯通的大。三、从价值观念来看,“大”是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采取简单鄙夷、菲薄的心态,而是抱一份温情与敬意,以一种弘扬的态度,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格局下,通过创新性的总结与研究,将中华文化之美展现给国人,展现给世界。这里的“大”是光大的大。

有学者以设立国学是重复建设,甚至以对现有文史哲学科体系形成了冲击为理由,来质疑国学的合理性,实在是杞人忧天,不值一驳。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学术界一方面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学科体制,建立了中国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新学科,史学、文学等学科也大量运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新建立的学科归于国学之下。这样,国学就是一个学科门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随着文史哲等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国学也就逐渐解体,让位于以文史哲为主的现代学科体系。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国学,它不是一个学科门类,而是一门具体的学科,是学科之学,而不是门类之学。其地位类似西方的古典学,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无法在现有学科体制中容身的内容,如经学、子学、文史之学等,做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它对于文史哲等学科而言,不是一种重复建设,更不是一种冲击和挑战,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同样,出土文献也是一门新兴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现有学科体制下,很难确定其身份和位置。若将其放在国学之下,作为中国古典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疑是十分合理的。而国学院贯通文史哲,重视文字、文献、思想义理的教学方法,更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出土文献研究人才。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热中,胡适先生曾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但由于其“全盘西化”的片面认识,始终无法处理好“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关系,无法将古代文化转化为“再造文明”的丰富资源。今天我们不能再做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事情,而应以开阔的心胸、创新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传统,面对自己的文化。在今天,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主张是:“挖掘古典,返本开新;融汇中西,再造文明。”

杜维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考古挖掘突然发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遗稿、残卷,那一定会大大震惊整个西方学术界,并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饶宗颐先生也期望郭店竹简等文献的发现,会带来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确,近些年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建文明”的有益资源,如郭店竹简“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批判精神,“利天下而弗利”的禅让贤者而不是子女的制度设计,以及重视身教,以身作则的领导方法,等等。对出土文献中这些新发现的观念、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论阐发,一定会大大改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作为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研究的最重要基地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当然不仅不应缺席,而且理当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作出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

我相信在后面的会议中,围绕这些问题,各位学者代表一定会有精彩的议论和高见,一定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前 言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经历了由旧到新、新旧并存、推陈出新,中西冲突、中西并存和中西融合的复杂过程,因而思潮迭起,色彩斑斓,十分复杂。而就历史、思想及经典、史料的整理而言,有两股思潮值得重视和反思,一是上世纪 20 年代形成,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巨的疑古思潮;一是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至今仍十分引人瞩目的“走出疑古”的思潮。

后者之于前者,针对性很强,所以引起的争论也特别大。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并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为了便于人们了解这些争论,我们选取了其中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编成《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一书,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前后两股思潮,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编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无意绍述、点评各家的观点。但总结其中的问题,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继续注意:

其一,疑古学者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着哪些不足?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引出了什么新问题?

其二,走出疑古,或曰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与批评,主要是针对什么而展开的,是疑古学者的观点,还是他们的方法,拟或是他们的观念?

第三,从哲学的层面说,信古与疑古都是对“古”的理解与解释,那么“释古”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相对于信古与疑古,“释古”的古史观念和古史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

第四,依据目前所发现的出土文字资料能否重建古史?

第五,目前所见的属于先秦的出土文字资料,的确属于真实的先秦文献。但真实的先秦文献是否意味着其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

第六,如何认识“二重证据法”的局限性?

第七,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第八,独立的考古学研究对于古史重建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但编者认为,上述八个问题的梳理或解决,可能对目前的古史研究更具理论意义。

由于编者的学识有限,编辑的文章,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谅解。

—目录—

疑古论说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	3
《古史辨》第四册序(《顾序》)节选	顾颉刚	9
答顾颉刚先生书	钱玄同	21
答刘胡两先生书	顾颉刚	31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	35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张荫麟	42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冯友兰	54

走出疑古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59
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李学勤	71
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廖名春	85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廖名春	100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郭沂	114
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朱渊清	124

观点争鸣

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	刘起钊	145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杨春梅	154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陈其泰	191
如何理解“释古”	梁 涛	205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 曹 峰	208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沈颂金	227
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	张 越	237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构

《古史新证》(节选)	王国维	247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吴怀祺	251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张光直	258
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	裘锡圭	267
论古史重构	晃福林	286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 淳	298
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	梁 涛	319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曹 峰	327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郭齐勇	350

疑古论说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

我两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两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地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

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此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处,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

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罔官》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缙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缙”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着继续前人之业。到《罔官》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不说后稷缙黄帝的绪,缙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主(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缙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两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内,象形。”内,《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

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观念,于是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承“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蚩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閟宫》说后稷“缙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